

THE SI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3

《看历史》杂志◎主编

中国历史的侧面Ⅲ

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历史不仅是镜子，还是种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承担者，
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的侧面Ⅲ

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THE SI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3

《看历史》杂志◎主编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的侧面. 3, 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 《看历史》
杂志主编.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80256-904-1

I. ①中… II. ①看…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1625 号

责任编辑: 张天放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904-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人物观察

- 文 | 李远江 “终结者”李斯 / 2
- 文 | 张景平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 8
- 文 | 赵健 范仲淹临危受命 / 18
- 文 | 丁三 白伟志 曾国藩 1870，烈士暮年 / 26
- 文 | 刘永锋 李鸿章 1895，穷途末路 / 38
- 文 | 李远江 梁启超 1919，被抛弃的勇士 / 45
- 文 | （澳大利亚）雪珥 “流氓”忠臣洋家将 / 55
- 文 | 傅国涌 宋教仁呼吸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 64

第二章 疑案迷踪

- 文 | 赵健 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 68
- 文 | 十年砍柴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 75
- 文 | 赵爽 苏生文 顺治皇帝出家迷雾 / 78
- 文 | 赵爽 苏生文 雍正暴崩之谜 / 86
- 文 | 赵爽 苏生文 乾隆身世之谜 / 94
- 文 | 赵爽 苏生文 嘉庆遇刺之谜 / 102
- 文 | 张鸣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 110

- 文 | 范金民 王桐 史桢豪 明代的肃贪反腐与清官廉吏 / 114
- 文 | 李晓巧 清朝奇案：贪官谋害清官 / 120
- 文 | 杨智友 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 / 122
- 文 | 马振犊 邢烨 民国反腐“肌无力”（上） / 129
- 文 | 马振犊 林建英 民国反腐“肌无力”（下） / 135
- 文 | 何书彬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 141
- 文 | 马勇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 / 152

- 文 | 吴安宁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 156
- 文 | 何书彬 亦真亦幻“大槐树” / 165
- 文 | 张鸣 “偶然”的历史 / 175
- 文 | 张鸣 穷京官混世之法 / 177
- 文 | 李开元 国士无双 / 180
- 文 | 十年砍柴 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 / 184
- 文 | 泓景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 188
- 文 | 唐博 中国人的隐逸史 / 194

- 文 | 庄秋水 开元，全盛之日 / 198
- 文 | 维舟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 202
- 文 | 胡丹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 210
- 文 | 张建英 一个县令的 1635 / 218
- 文 | 孙展 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 / 226
- 文 | 黄艾禾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 233
- 文 | 潘前之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 240
- 文 | 庄秋水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 252

第一章 人物观察

“终结者”李斯

文 | 李远江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 247 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 19 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

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其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

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

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 230 年，秦灭韩；公元前 228 年，秦破赵；前 226 年，秦破燕；前 225 年，秦灭魏；前 224 年，秦灭楚；前 222 年，燕赵残余俱亡；前 221 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文 | 张景平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

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

唐玄宗还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太宗经常与臣子一起举行文学化的宴会，君臣如诗友一般共相唱和，并由此构成一种仪式化的君臣交际形式。武后、中宗时代的宫廷文学活动更为兴盛，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批工于诗文的文人以倡优形象进入宫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嫔喜欢以裁判

者的身份凌驾其上，更乐于看到他们为争宠而争风吃醋。

玄宗同样喜欢有才华的臣子，但对他们比较尊重，“翰林学士”这个一度沦为吹鼓手的文士群体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发挥智囊作用；当他们在宫中连夜起草诏书时，玄宗有时会如朋友一样去看望他们并赐予饮食。这个传统为唐朝后期的帝王所继承，翰林学士也从皇家的高级文化侍从变为帝国中枢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七岁的神童李泌因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宫时，玄宗对其才华大为叹赏；但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做宫廷中的玩偶，而是将其送出长安这片是非之地并保障他专心读书。很多年后，已成长为一位传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后辅佐三位皇帝平定了两次危及帝国生存的巨大叛乱，并通过建立包括大食、回鹘、南诏在内的国际联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玄宗的知遇与培养，成为李泌报效其子孙的巨大动力。

在恢复“贞观故事”的号召下，唐玄宗以拨乱反正的姿态，使得帝国的政治空气从之前的紧张乖戾迅速走向宽松平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宗重新确立了以儒为主的治国理念，不仅自己撰写了《孝经》，还通过各种手段宣示皇帝与诸亲王间“兄友弟恭”的和睦状态。不过，他并没有清算给予武则天统治巨大帮助的佛教，对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样尊崇有加。出入皇宫的，既有来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隐居深山、修炼长生之术的张果老一类人物。唐玄宗对于宗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但将某种宗教兴趣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这一点与太宗颇为相类。

然而，“开元”绝不是对“贞观”的简单克隆。对于各种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确表示厌恶并明令禁止上报，玄宗却不惜借用日食预报的失败来证明君主的德行已经感动上苍。从高宗时代开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谶纬意识重新发酵。渐渐地，人们对皇权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乐道。面对这样的社会心理，玄宗君臣并不能免俗，其实他们对自然现象与政治更替的联系并不真正相信。玄宗与姚崇在开元初年围绕“祥瑞”与“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实在是一种刻意的政治表演。我们由此能够观察到玄宗施政风格迥异太宗之

处：为达目的而进行的变通较之对价值理念的坚持更占上风。

贤主

作为中国历史上贤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合儒家的标准，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业似乎在于把来自实践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并试图为政治手段赋予超越性的价值含义，在保障君主行为有效性的同时去除虚伪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义治国，统治技术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龄执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内晏然，另一方面却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资纪念，被史家认为是达到了宰辅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对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高宗朝以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漫长险恶，使玄宗对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真切的认识。唐玄宗对确保统治牢固与帝国繁荣充满强烈的欲望，他认定这些目标只有通过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更为灵活但却不那么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体现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唐玄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事务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当时私铸钱币之风非常兴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锚泊的大船上开炉鼓铸，惊涛烈焰，蔚为壮观。玄宗向劣币开战，强令对市面流行的劣币收缴重铸，结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复几次后终觉难以推行。不过，帝国的财政基础还是通过另外两项措施得到了强化。第一项措施被称为“括户”，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种原因隐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宽宥政策与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重新登记户口，恢复为国家纳税。第二项措施为改良运输方式，以保障来自南方的赋税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安全运到帝国的政治核心区关中与洛阳，具体办法是把以运河为主体的运输线分为数段，每段设置中转储备仓库，根据各段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化长途运输为短途运输，人称“节级转运”。

这两个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财政精英的主导下得到顺利实施，但因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为他们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税收而非减轻民众负担，因此长期被后世冠以“聚敛之臣”的恶名。但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长安城日益庞大的支出，玄宗也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不是“君子”，因为现实的考量决定了皇帝必须倚重他们。

开元时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但通过考试的人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是否能真正获得一官半职还要经过另一轮选拔，即铨选。有资格参加铨选的还有另外三类人，即高级官僚的子弟、表现优秀的低级公务人员以及原任期已满等待新职务的前任官员。随着有资格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突出。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铨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廨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